

人文地理学丛书

# 人口地理学

RENKOU DILIXUE

罗辑 陆玉麒 吴勇 编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人文地理学丛书

# 人口地理学

RENKOU DILIXUE

罗辑 陆玉麒 吴勇 编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 第一章 绪 论

当今世界面临着人口急增、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粮食短缺、资源匮乏五大问题的挑战。而究其原因，都可归结到人口问题上来。尽管这种说法不一定全面，但至少反映了研究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奠定了它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基本地位。人口地理学是人口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 第一节 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一、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国内外不同学者有过各种不同的表述。美国原地理学会会长霍瓦沙认为：“人口地理学是了解地球上居住人口的地域差异性。”李旭旦先生赞同此种观点，认为是研究人类居住在地球上的差异性（包括人口的数量、增长、分布、密度、迁移、结构和人口问题）。胡兆量的看法则稍有不同，认为是“研究各国各地区的人口数量、构成、分布、密度、流动的历史情况”。与此同时，胡焕庸先生也提出是“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人口的增长、结构的分布和迁移，尤其是侧重于人口过程的空间表现形式和地域差异”。这些论点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地域差异，只不过有的侧重于现象的研究，有的偏重于过程的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或强调把人作为劳动力资源来考察。例如，美国宾州大学地理系柴林斯基，提出人口地理学研究对象包括描述人口分布的特点，分析人口分布

与空间的表现形式以及形成这些形态的相关因素(自然和社会环境);苏联学者波克什舍夫斯基则认为是研究人口构成和人口与居民点的分布情况,着重从物质生产的分布角度考察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显而易见,上述各家之说尽管表述方法不同,形式各异,但却大同小异,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人口特征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构成、分布、流动及其变动等方面;第二,研究角度是区域角度和人地关系角度。但对人口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这种理解显然忽略了另一重要方面的研究,即忽略了人口特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亦即人口特征的人文效应的研究(关于人口特征的人文效应的重要性参见第四章、第五章的论述)。因此,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表述为:人口地理学是从地域和人地关系角度研究人口特征(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构成、分布、流动、变动)及其人文效应的科学。

## 二、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从思路上考察,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地关系及其地域差异的研究,尤其侧重于人口特征与区域条件、资源、环境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第二层次是对人口特征与经济、社会运行的空间相关关系的研究。第三层次是对人口特征本身空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如人口容量、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的研究。

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思路可具体化为人口地理学的以下的研究内容:第一,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研究。这是从人地关系角度研究所必然衍生出来的领域;第二,人口流动研究,包括人口迁移与人口移动两个方面。人口流动不仅是从人口容量角度进行研究人口分布的基本途径,也对社会经济机制的运行带来重大影响,

如区域经济格局变动、城市化等；第三，人口分布与人口构成研究。两者分别论述了人口的数量特征与质量特征。人口地理学主要侧重于研究人口分布与人口构成的地域分异规律；第四，区域人口发展战略与区域人口政策研究。这是在前三者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综合的、预期性的研究。

### 三、人口地理学的学科地位

人口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第一，从人口角度考察。除了人口地理学是研究人口外，尚有人口生态学、人口经济学、人口历史学、人口民族学等学科也在研究人口问题。如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科学；人口生态学是研究人类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生态系统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科学；人口历史学着重探讨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发展、构成及其特征；人口民族学则侧重于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经济、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习俗对人口发展的影响。除此以外，还有人口统计学、人口社会学和人口遗传学等。这样，人口地理学与这些学科尽管研究侧面各不相同，但都处于并列的地位。然而，它又是研究人口问题的综合性科学——人口学的分属学科。

第二，从地理角度考察。人口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处于同等的地位，都从属于人文地理学或地理学。因此，人口地理学是介于人口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 第二节 人口地理学研究的两条理论主线

### 一、科学的历史观

人口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人文分支，更多的带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我们就无法揭示任何人口现象的本质。马克思在1845—1846年所著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sup>①</sup>

在这里，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历史活动，作为人类生存从而也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界的联系，人不可能从无造出有来。所以，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改造，是人借助于一定的生产工具，直接取得自然生产物或对自然物质进行加工来实现的。这种人和自然界的联系是人类获得生活资料即生产劳动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其次，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方式不同于一般动物。人类是一种有社会组织的动物。人们要能够进行生产劳动，首先还必须组成一定的社会联系，以某种特定的社会组织从事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联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

---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1页。

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有生产。”<sup>①</sup>马克思把人类借助一定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的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之为生产力，把人类为进行生产而结成的社会关系，称之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在经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后，马克思总结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成的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归根到底就是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历史。

马克思在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同时，还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必然地产生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和政治、法律等社会设施。这些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是一对矛盾的统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发生改变之后，上层建筑或迟或早也会发生变化。当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向前推进的时候，社会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义，是用以正确地解释所有社会现象的科学的历史观。

自从马克思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以后，这个曾经被看作毫无规律的神秘的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终于变得可以被认识了。只有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才有可能揭示出社会历史的本质，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依据历史唯物论，人口现象的本质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

### 1. 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把人类社会历史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历史的时候，包括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讲述了社会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两个方面后接着说：“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天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让德国人能够了解，把它们看作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还在历史上起作用。”<sup>①</sup>很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把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始终存在的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只有把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才有可能揭示人口过程的一些规律性。

### 2. 人类自身生产隶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

马克思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即人口过程当作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但并没有把人口过程同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同等看待，而认为人口过程隶属于生产资料生产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sup>②</sup>斯大林也指出：“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33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sup>①</sup>

由于马克思把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放在历史的首要地位，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那么，社会生活的另一方面即人类的生殖、人口的繁衍就成为从属的地位，是由物质资料生产所决定的社会因素。

### 3.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规律

马克思主义把人口过程从属于社会生产方式，同时也就承认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特征。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人口经济规律时指出：“雇佣工人阶级生产出资本，并随着它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同时它自身就生产出解雇自己或者把自己变成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并且同它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口规律。实际上，每一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有它特有的人口规律。这一规律只适用它，同它一起存亡，因此只具有历史意义。抽象不变的人口规律只对植物和动物来说才存在，并且只有在这些植物和动物不受到人的影响的情况下才存在。”<sup>②</sup>

换言之，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经济规律、经济特征，人口过剩的规律性是要受到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制约的，这就必然地显示出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所以，人口过剩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规律性。

### 4.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基础和主体

马克思把人口隶属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之下，也绝不

---

<sup>①</sup>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4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238页。

是看轻人口的重要性，把人口当作可有可无的社会因素。相反，马克思把人口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人口因素的重要性。没有一定数量和密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生活。这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力当作整个人类历史中最赋有生命力的社会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社会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又是劳动者。所以，人口状况对于社会生产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原理，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这个社会因素又是属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并受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经济规律所制约。以此观点观照现实人口问题，可以有以下认知：

#### 1. 贫穷并非人口增长造成

既然马克思把人口问题当作从属于经济规律的社会因素，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现象就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人口增长。

从战后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舆论界加强了这样的认识，即由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而致使经济建设收效甚微。这个最初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越传越普遍，其实是不正确的。人口过程不过是从属于经济关系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关系下，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不利的从属地位。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经济时曾经指出，帝国主义要从“牛身上剥下两张牛皮”。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在不是要剥下两张“牛皮”，而是要剥下三张、四张“牛皮”了。一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掠夺的廉价原料。原料是帝国主义得以维持的基础，比如发达国家从海湾国家得到的石油，要比从自己本土上开采便宜数十倍。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简直是无代价地取得资源；二是

发达国家出售给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技术，是以垄断价格销售给发展中国家的；三是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从发达国家借贷资金，受高利贷的盘剥；四是发达国家以发达的教育鼓励和吸引发展中国家输送高级人才，名为代培，而后又以较高的生活条件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据世界银行统计，1969—1979年十年时间，美国接受了近50万名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来移民，其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智力投资收效甚微。如此等等，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帝国主义发展理论，才有可能正确理解世界人口问题。

## 2. 人口问题最终在社会经济变动中得到说明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迟缓，不同的国家，其产生的原因各各不同。我们不能把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以及历史传统和经济制度各不相同的一百多个国家的问题都归因为人口增殖。例如，有的国家的经济困难显然是同新老殖民主义制度有关。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是宗主国的种植园，主要是为国际市场供应单一的可可、橡胶之类的经济原料，国民经济发展畸型，以至在他们摆脱殖民统治以后经济很难取得进展。还有，有的国家的大地产由少部分人占有，大多数人失去土地，而工业又在同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绝大多数人不能取得职业，所以“人口过剩”的现象就十分严重。再如，在一些国家中，国家制定了工业发展规划，但与此相应的农业生产以及有关的社会工作没有跟上，城市化过程太快，农民一下子涌进城市，而城市又无法容纳猛烈膨胀的劳动者，这又表现为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就业、交通、住房、犯罪率上升等问题。还有一些是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严重，要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是因为缺少理想的国际环境。发达国家在老殖民主义时代就在这些殖民地培植了不少政治派系，新殖民

主义条件下又使这些派系增多和复杂化。各派系不休的争斗、政变、暴乱等政治社会的动乱连绵不断，使这些国家很少有经济发展的条件。显然，各个国家的困难表现也许是相同的，但造成的原则因迥然相异。

因此，发展中国的人口问题，只能到各个国家的具体的经济社会制度和历史变动因素等方面去寻找其产生的原因。

### 3. 人口问题的成功治理不能脱离唯物史观的指导

治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只有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分析出社会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的症结。同理，也只有在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根据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口学观点，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由人口增长造成的，比如“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只有停止人口增长和工业投资才有可能避免人类的毁灭。而发展中国的工业投资比例原本就相当低，因此只要制订出停止人口增长的规划，就可以使人类免于灾难。这是简单化的想法。可以想象，一个孤零零的人口政策和规划，不仅不可能改造社会，并且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出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然后制定出以排除主要阻碍因素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治理的社会发展规划。否则，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 二、正确的人地观

人口地理学由于对人口现象地域差异以及对与地理环境相关要素的注重，而有别于人口学及地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因此，人口现象与地理环境相关关系的哲学思考，构成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另一条理论主线。在人与环境的种种理论中，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备受非议的一个理论。笔者在此无意于重复这场争论，而仅想

指出，目前各类书籍、杂志中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事实上仅是早期形式的批判，即是对孟德斯鸠、巴克尔、拉采尔等提出的带有明显唯心主义倾向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对的，但早期形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远不能代表这一理论的全部内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以生产力为中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较为正确地说明了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且马克思对此也作了相当详尽和精辟的阐述。

### 1.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史论丛》和《马克思主义问题》（这些均见于《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1—5卷）一系列主要著作中，总是拿出相当篇幅，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地理环境的作用。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这种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划时代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完整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唯心主义逐出了最后一块活动领地。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大飞跃，历史的研究从此被置于坚固的现实基础之上。但这一学说从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种种非难与攻击。在这群“有学位的奴仆”之中，即有俄国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和卡列也夫等人。

他们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说道：“谁也不争辩在人类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人的智慧。因此，归根到底，智慧的努力——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这就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这就是说，那些断言世界为意志（即人的理性）所支配的人们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第679页）。

普列汉诺夫当然不同意这种具有明显唯心主义倾向的论点。也正是从俄国民粹派的反论中，促使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创造第一把石斧，从而摆脱动物状态以前，根本就没有什么生产力，那么，制造第一把石斧的智慧从何而来？他认为，这是唯物史观所没有解决，从而给唯心主义者钻了空子的一个重大问题。顺着这样的思路，通过近三十年的研究，他终于对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如前所述，触发普列汉诺夫重视地理环境的理论基点是制造第一把石斧的智慧从何而来？其研究也由此起步。他认为：“只因为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属性的萌赐，我们的人类的祖先才能提高到转化为……（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需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和这完全同样地，也只有地理环境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动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第681页）人类社会经过地理环境的第一次推动之后，“他们的往后发展就按自己本身的内部规律进行，……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为间接的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第766页）。换言之，“自然界，亦即围绕着人的地理环境，是促进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第227页）。1897年1月在《谈谈历史》一文中又写道：“自然界本身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始推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第250页）。

后来，普列汉诺夫取消了地理环境决定作用在时间上的限制，不再把它仅仅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推动力”，而是当作一个永恒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加以表述。在1898年所写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中，他强调指出：“在每一特定的时代中，生产关系的特点不是决定于‘机会’和人们的‘天性’，而是决定于人们

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首先是地理环境的性质，决定着受人们支配的生产力状况”（《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第250页）。在1907年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他又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答案<sup>①</sup>把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所支配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什么原因来决定的呢？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式首先就是地理环境的性质”（《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3卷第163页）。又说：“总之，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3卷第165—166页）。

上述可见，普列汉诺夫思考问题的逻辑过程是：社会的发展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历史。生产关系不是决定于人的天性，而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所支配的。但生产力发展最初的决定性原因则是人们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性。这是因为，类人猿之所以能转化为人，人使用和制造生产工具的劳动资料的能力都是地理环境所给予的。所以，人类社会历史的初始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最后都应用地理环境的作用来解释，从而形成如下公式：地理环境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其它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换言之，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早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以生产力为中介，后者则以人的心理、意志为中介。

普列汉诺夫还以大量例子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写道：“原始

---

<sup>①</sup> 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的智慧发展，在原始社会之间的互相接触愈大的地方，就愈迅速，而这些接触，当然，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地理条件愈多差异（即因此，在一个地方的生产产品较之另一地方的生产产品愈少相似），则愈频繁”（《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第680页）。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时地理环境的作用不会更小。“在中国和阿提喀，在北美洲平原和尼罗河沿岸，发现初期的社会关系形式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是相同的。研究原始制度的科学到处都发现譬如说民族生活方式。显然，人类有着同一个出发点。但是，由于生存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氏族生活方式让位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进程。当然，这里有许多东西也依赖于该社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人类发展的地理背景毕竟无疑地表现出强烈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于更大的社会的命运，对于产生于原始氏族组织之上的国家的命运所加予的决定的影响，不会更小”（《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4卷第44页）。他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第681页）<sup>①</sup>。

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普列汉诺夫着重分析了俄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俄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他说：“俄国历史进程的相对特殊性的确可以用俄国人民必须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那个地理环境的相对特殊性来说明。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之所以非常大，唯一是因为自然条件的相对特殊性决定了俄国经济发展的相对特殊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结果就出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



现了莫斯科国家同样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3卷第99页）。

不仅如此，普列汉诺夫还试图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不同方面的影响。他在谈到从氏族社会组织解体中产生的东方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时说：“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在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3卷第178页）。地理环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问题，普列汉诺夫也谈过一些看法。他写道：“甚至在生产力发展的很低程度上，并不是在所有农业民族那里都会产生专制君主政体。历史上是否可以指出农业公社公私制联盟的例子呢？在这种场合，除了农业劳动条件以外，还必须注意黑格尔称之为‘世界史的地理基础’的那个东西。农业公社的公私制联盟几乎只在山地国家中或者一般地自然界保护的国家中产生。而另一方面，居住在广阔的平原和大河流域的农业民族到处都形成了专制制度”（《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5卷第56页）。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著名的活动家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指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sup>①</sup>列宁曾建议把普列汉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2卷第84页。